

## 宋蜀刻本《张说之文集》流传考

朱 玉 麒

### 一、宋本《张说之文集》版本研究的意义

张说（667—731），字说之、道济，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封燕国公。他从武则天到唐玄宗阶段，出将入相，前后三秉大政；又以“大手笔”之称，为一代文宗。但作为入唐以来传世作品最多的作家，张说文集的整理与版本的研究工作并不尽如人意。全本的三十卷《张说之文集》宋本在元明以来便似绝迹天壤；明代以来，嘉靖年间刊刻的二十五卷本《张说之文集》虽然残缺不全、舛误满篇，却被奉若珍宝，屡经翻刻。乾隆以后，公私藏书家在明刻本基础上，对后五卷的阙失虽有所补佚，同时也打乱了原来的编排而更为远离宋本原貌。直到今天，通行的版本均系这样一种清人苦心孤诣而不得要领的二十五卷增补本。

民国年间，藏书家邢之襄与周叔弢都偶然获得了《张说之文集》的宋刻三十卷影钞本，其流传有绪，是最接近于原貌的善本。随着《藏园群书题记》的叙录，这一上下达数百年的宋本求索历程似乎因之尘埃落定<sup>①</sup>。但有关宋本的行款、宋本在流通中的影响；在宋本绝迹的数百年里，流传的各种重编本如文集补遗本、诗文分类本、诗集本等相互之间的传承关系；散佚作品收集的真伪可信程度——诸如此类的问题，仍未得到进一步的清理、研究。此外，除了有限的利用，影宋本《张说之文集》全帙的价值似乎还

未得到充分的认识<sup>②</sup>；而作为唐代文集流传的个案，张说集丰富而复杂的版本关系所带来的典型性也显而易见。笔者此处的版本研究，即想对宋本《张说之文集》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考述，提供一份清晰的版本传承报告，以裨于唐代文献与文学的研究。

## 二、宋刻本的著录与影宋本的发现

### 1. 唐五代、宋明之际的张说集著录

张说文集今见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日本的《本朝见在书目录》（后世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该书一卷，由日本9世纪中后期著名的文学大臣藤原佐世（？—897）在阳成天皇年间（876—884）奉敕编撰，是日本今存最早的汉籍目录著作。它记录了相当于唐朝后期僖宗年间在日本国家各公务机构和天皇私人藏书处实际收藏的汉籍目录<sup>③</sup>。在第三十九类“别集家”中，著录有“《张说集》十”这样一条内容。根据在中国同时而稍后的文献记载中有关张说集的情况及现存版本来看，张说集在唐朝主要流传着一种三十卷的诗文合集，其中前十卷为诗集（包括赋五篇），而《本朝见在书目录》中著录的十卷本，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从三十卷文集本中传抄下来的诗集单行本。

在中国本土，张说文集的最早记载，是五代后晋刘昫等所撰的《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称“（说）有文集三十卷”，这应该指的是唐五代流传的版本情况。其后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一二五《张说传》云：“说歿后，帝使就家录其文，行于世。”卷六〇《艺文志四》著录“《张说集》三十卷”<sup>④</sup>。可见张说集在唐时是由皇帝亲自过问而大行于世的集本三十卷本。

但以上著录的北宋以前的张说文集，皆不传。今传之椒花吟舫本三十卷，作为南宋蜀刻本的影钞本（详下考），在很多地方显示出来自家集本的特点。如卷一有唐玄宗《过大哥宅探得歌字韵》，张说的和作没有像其他奉和诗一样径作《奉和应制》，而是



很得体地改为《奉和过宁王宅应制》（玄宗称大哥者，宁王李宪）；后来的《唐诗品汇》卷五八选此诗，就作《奉和圣制过大哥山池》，显然就不是从家集本中选出的。又如卷二四《百官请不从灵驾表》，注“为李峤作”，自是据家藏底稿选入；《文苑英华》卷六〇〇径作李峤作品，应是据内府档案上表的署名而辑入。又有卷一五《请许王公百官封太山表》一篇，系当时与源乾曜同时连上三表之第三表，不收前二表，当系他人草稿，而此篇则为自作；后来的《唐文拾遗》卷一八不明就里，据《册府元龟》源乾曜列名在张说前，而将此作归于乾曜名下。凡此种特征，均表明从唐到南宋，《张说之文集》三十卷一直是传承有绪的家集本。

在宋代，最受后人推崇的两部藏书目录著作——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都详细记载了张说文集的情况，也都著录为三十卷。此际的尤袤在《遂初堂书目》中虽也著录了《张说集》，但未标明卷数。

在元代，《宋史》卷二〇八《艺文志七》根据前朝留存到元朝宫廷的藏书，记录为“《张说集》三十卷，又《外集》二卷”。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五八，也著录有“《张燕公集》三十卷”；但他主要沿袭了《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題》的记载，是否真正经眼，很难肯定。

不过在明代，焦竑（1540—1620）于万历年间据内阁藏书编定的《国史经籍志》卷五“集类”中，也还著录了“《张说集》三十卷、又《燕公外集》一卷”的内容，著录的明确性使其存在的可信度毋庸置疑<sup>⑤</sup>。《宋史》所记“《外集》二卷”与这里的“《燕公外集》一卷”，当同样属于宋本三十卷之外的辑存集外作品<sup>⑥</sup>，从今天我们所能补遗到的诗文看，确实还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篇章，来自官府秘藏和《文苑英华》、《唐文粹》等宋刻总集，为后人的“外集”辑佚提供了便利。此外，与焦竑同时的陈第（1541—1617）在自编的《世善堂藏书目》卷下“集类”中，也著录了

“张燕公集三十卷”，他从焦竑那里钞录了许多“未曾见书”来充盈自己的藏书（参《世善堂书目题词》），在明代绝少流传的三十卷本张说集或者也是从焦竑那里传钞得到的。

明代藏书著录张说集者尚有多种，然皆不载卷数。因此三十卷本张说集在明代的著录仅此两处而已。而综合宋元明三代的著录来看，传承唐代家集本而来的宋刻《张说之文集》三十卷本的存在，应该是确凿无疑的。

## 2. 清代宋本唐人集的递藏与影宋《张说之文集》的发现

清代以来的藏书著录，关于宋刻《张说之文集》三十卷本，仅在南北各一见。南方则为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绉云楼书目》卷三所载者：“宋板张燕公道济集三十卷。”但如众所周知，绉云楼在顺治七年（1650）惨遭回禄之灾，其中藏书悉被焚毁，因此所藏《张说之文集》也不复人间。

在北方，宋刻《张说之文集》有曾经在三家流传的说法：

至《直斋》所称“蜀本六十家集”，世无完本。大兴朱氏椒花吟舫有如干家：《权载之》五十卷，嘉庆某年刊行；《张说之》三十卷，江都汪孟慈为予写其副；其余闻有《王子安》等而未审。（顾千里《〈王摩诘集〉跋》）

《张燕公集》二十五卷，唐张说撰。其集唐志作三十卷。……顾千里家有三十卷钞本，系由朱竹君家宋刊本转钞。刘燕庭有宋刊唐三十家文集，如二张、权载之、《会昌一品集》等，皆足本。系刘公勔藏书。并有元翰林国史院书长印。《续录》：宋蜀本三十卷，十一行，二十字，刘燕庭藏。（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一五）

刘燕庭曾藏宋刊三十卷本，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与李太白、骆宾王等集同行款，考为蜀本，自朱竹君椒花吟舫散出为燕庭所收，今又不知归于何所。（缪荃孙《〈张说之文集〉结一庐剩餘丛书本跋》）

综合以上的论述，可知《张说之文集》三十卷，曾经在刘体仁（字公勑，又作公勇、公愚）、朱筠（1729—1781，字竹君，斋号椒花吟舫）、刘喜海（1793—1852，字燕庭，一作燕亭）处收藏。但刘喜海藏《张说之文集》，却有来源于刘体仁、朱筠的不同说法，其间离合，尚待分辨。

刘体仁，生卒年不详，颍川（今河南许昌）人。与他同为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的王士禛曾记载“刘公勑家有宋刻唐诗三十家”<sup>⑦</sup>。在今存宋蜀刻本唐人文集中，有十一种上钤有“翰林国史院官书”、“颍川榴考功藏书印”、“体忍”和“公愚”等印，为刘体仁见藏元国史院散出唐人文集的确切凭据<sup>⑧</sup>。

刘体仁藏唐人文集的流传，仍然可以在傅增湘先生的题记中见到踪迹：

忆戊申、己酉间（1907—1908），述古堂书贾于瑞臣得唐人集数种于山东，诡秘不以示人。余多方阁寻，乃得一见。计所存者为《司空表圣文集》、《李长吉文集》、《许用晦文集》、《郑守愚文集》、《孙可之文集》、《张文昌文集》，皆完整无缺。外有残帙三册，为《新刊权载之文集》八卷，自卷四十三至五十，《新刊元微之文集》十六卷，自一至六，又末十卷，即此册也。其后六唐人集为友人朱翼庵所得，权、元二残帙为袁寒云公子所得，余皆假校焉。（《校宋蜀本〈新刊元微之文集〉残卷跋》，《藏园群书题记》卷一二）

旧传朱竹君家曾藏宋刊三十卷本（《张说之文集》），后自椒花吟舫散出，为刘燕庭所得，其行款与权文公、孙可之、皇甫持正、司空表圣等集同，号为蜀本。迩来刘氏遗书不守，权、孙诸集先后流入肆间，表圣《一鸣集》为余所获。（《影宋本〈张说之文集〉跋》，《藏园群书题记》卷一一）

上引第一段文字所及八种唐人集均有刘体仁藏印，第二段提及的“权、孙诸集”又多在于瑞臣所收八种唐人集中（仅一种《皇甫持

正文集》不属此列，但也系由刘体仁处散出为袁克文所收<sup>⑨</sup>）。因此从这两段题记所谈的同一件事上，可知钤有刘体仁藏印的唐人文集也就是朱筠所藏。

朱筠藏书流入刘喜海处的说法是否可信？据郑伟章《文献家通考》“朱筠”条记载：喜海咸丰二年（1852）去世后，其后人即将所藏部分善本在京出售，翁心存“力不能购，仅得其零简残编”，其中便有《椒花吟舫书目》一种。翁氏因作跋云：“刘氏图书大半得自朱氏，今刘氏又不能守，化为云烟矣。”<sup>⑩</sup>所以，朱筠藏书为刘喜海所得的“旧传”也是确凿的。

由此可见，刘体仁的唐人集应是先为朱筠所藏，后人诸城刘喜海处，最终又流散到北京书肆，为朱翼庵、袁克文等先后收藏。但在这流传有绪的宋刻唐人文集中，“独燕公集乃不可踪迹，常引为大憾。”（《影宋本〈张说之文集〉跋》）

1934年，傅增湘先生终于在莲池书院同学——另一位民国藏书家邢之襄处得见《张说之文集》三十卷的影宋钞本。因为对张说作品的始终爱好，以及对《张说之文集》的追踪有年<sup>⑪</sup>，这一传承已久的钞本价值终于在他的法眼中显现出来。而同时，另一转借自周叔弢处的《张说之文集》三十卷、附补遗一卷的清钞本，也经他重新审视，而确认了同样的地位。这两部影宋钞本，均由上面提及的最后的个人收藏者邢、周二先生捐赠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研究宋刻本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

### 三、椒花吟舫影钞本《张说之文集》考

#### 1. 椒花吟舫本的版本特点

椒花吟舫影钞本即邢之襄捐赠的三十卷本《张说之文集》（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编号10189.6155，以下简称“椒花吟舫本”），傅增湘先生最先给予了详细的著录：

原本竹纸，乌丝阑，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一字，各卷有

目，接连本文。钤有“大兴朱氏竹君藏书之印”、“朱锡庚印”、“汪喜孙印”、“孟慈”、“星伯曾观”诸印。是此本为椒花吟舫据家藏宋本录出，断然无可致疑。（《影宋本〈张说之文集〉跋》）

傅增湘先生的题记准确地描述了椒花吟舫本的特征。需要补充、更正的是：原本三十卷，第十五卷无阑格，但仍按十二行、二十一字款式钞写；书前有总目，但非各卷也都有目，卷二至卷九的诗歌部分无目，其余二十一卷方有卷前目接连本文。在傅增湘先生著录以后，又钤有“邢之襄印”、“南宮邢氏珍藏善本”、“北京图书馆藏”诸印，显示了此书经由邢之襄而入藏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后期收藏过程。

椒花吟舫本的出现，不仅使朱筠曾藏宋本《张说之文集》三十卷本的真实性得到了证实，同时也在宋刻失散的情况下，为我们保存了《张说之文集》惟一接近宋本原貌的古本珍品（研录山房三十卷本系由此出，但改变了原行款，详下文），并提供了辨析前人著录错误的可靠依据。

## 2. 《张说之文集》十二行本系统辨

在今天的文献记录与留存中可以看到，宋蜀刻本唐人文集是中国雕版印刷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精品群体之一。按照刊刻的年代、行款与字体，可分为三个系统，即：一、十一行本，为南北宋之际的刻本，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二、十二行本，为南宋中期刻本，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一字；三、十行本，也系南宋中期刻本，半叶十行、行十八字<sup>⑫</sup>。

椒花吟舫钞本的《张说之文集》显然是属于南宋中期十二行蜀刻本系统的。首先是其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一字款式与之相符；更为重要的，是其避讳用字，也与时代相符。在钞本中，避讳字计有：玄、𦣻、絃、胤、弘、敬、镜、殷、匡、筐、恒、贞、桢、楨、搆、慎、敦、历、丘等，除丘改邱外，其余均为缺笔避讳。以上前五字系宋及清乾隆以来共同的避讳用字，所以回避比



较严格（但也偶有失误不避的例子）；后二字为清讳，显示了钞写于朱筠生活的乾隆年间的印记。其余诸字则系纯粹的宋讳用字（由避讳至“敦”字可知已是南宋光宗绍熙年间刻本），明显是钞手在朱筠的要求下力求遵循原刻的表征。但因为毕竟没有切身的政治压力和时代语境，所以时避时不避，显得更为随便<sup>⑬</sup>。但无论其自由度如何，以上避讳特征已足以证明，其行款绝非偶然地等同于南宋中期蜀刻本。

上述的辨析想要说明的是，在清人的著录中将《张说之文集》理解为十一行本的说法是错误的。持这种观点者有邵章、缪荃孙、江标诸人。前二人的论述见上引文，江氏的说法见《宋元本书目行格表》下卷：“宋本《张燕公集》，行廿字。涧蘋曰：宋槧唐集行款多如是（《思适斋集》）。”这些记载显然是未能亲眼见及其书而人云亦云所致。始作俑者，应是顾千里。顾氏在手校《张燕公集》后所作题跋云：

右秦敦夫太史藏本，所见《燕公集》以此为最佳。第十卷末页义门之以上脱，今就他本补之，恰得三叶，盖其行款每半叶十一行，每行二十字，宋槧唐集类如是，计有多家，此及《李翰林》、《骆丞》，皆其一耳。予前别校正燕公文十五卷，又从汪孟慈得椒花吟舫抄本，多出五卷，又益以《英华》、《文粹》所载若干篇，合此庶为全集，粗可写定。唯惜无好事者刊以行世也。

顾千里（1766—1835，名广圻，号涧蘋、思适居士等，以字行）是清代嘉道年间的校勘名家，经其题跋之《张燕公集》今已散佚，但跋语见存《思适斋集》卷一五，又载《思适斋书跋》卷四，所以在后世影响很大，成为人们追寻《张说之文集》的重要线索。从以上跋语可知：顾氏曾为秦恩复（1761—1844，字近光，号敦夫）校正过一种二十五卷本的《张燕公集》<sup>⑭</sup>，后来由汪孟慈得到椒花吟舫《张说之文集》的钞本，补出了后五卷，又增加散

失在《文苑英华》、《唐文粹》中的若干篇章，成为一个全集写定本。这一段文字的错误在于叙述第一次的校订中，原有缺叶，借他本补出了脱误；因为按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的款式正好是三叶，遂肯定其为宋刻十一行本系统。这样的推断是有缺陷的，因为《张说之文集》的秦敦夫藏本如果本身是十一行本，在流传中丢失了三叶，那么无论用十二行本或者十一行本补佚，只要来自同一个源流，就都会正好补出三叶来，这与宋本的行款并无关系。而且，他后来又通过汪孟慈得到了椒花吟舫《张说之文集》的影钞本，其为十二行本应是无可置疑的。在前引顾氏之《〈王摩诘集〉跋》提及《张说之文集》本与《权载之集》均出自椒花吟舫，而后者为十二行本系统，顾氏也曾经眼。所以此处将《张说之文集》宋刻比作十一行本的《李翰林集》、《骆丞集》，前后记载的矛盾所显示的疏忽是很明显的。

后人还有据这段话认为顾千里所校正之《张燕公集》即为宋刻本，如《思适斋书跋》卷四，即题此跋为“张燕公集二十五卷宋刻本”。这也属于想当然的理解。因为在顾千里的时代，宋本的意义非同小可。在《思适斋集》中顾氏为宋本唐人集的题跋由行款而源流，均竭尽全力给予品评、梳理，而对亲手校订之宋本《张说之文集》却如此低调处理，是难以想象的。结论只有一个，即其校订底本只是较为容易觅得的后代钞本或刻本。我们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还得以见到一个秦敦夫题跋的明龙池草堂本《张说之文集》（善本编号 5088），跋语云：

《唐志》燕国集作三十卷，宋以来诸家著录则皆二十五卷，与今本同。考《文苑英华》及《唐文粹》所载诗文，此集未收者尚六十一篇，盖撰录二书之时，其五卷尚未佚也。敦夫。这里的语气也极其平常，可见当时并未见藏任何宋刻。秦氏一生亦致力于唐人集的校勘、印行，如真有宋刻《张说之文集》在手，自不会等闲视之。但观其《石研斋集》，同样没有对宋刻《张说之

文集》收藏的片言只语。所以仅仅根据顾千里的题跋而认定《张说之文集》宋刻十一行本的存在，并进而肯定刘体仁、刘喜海藏本即此例证，只能是错误的结论<sup>⑮</sup>。

### 3. 椒花吟舫本的递藏

椒花吟舫本的钞写年代，根据上面的避讳分析及“大兴朱氏竹君藏书之印”，其在乾隆年间由朱筠据家藏宋刻本录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又据所钤“朱锡庚印”，可知此本由朱筠传给了其子朱锡庚。锡庚字少河，生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卒年不详，但在道光七年丁亥（1827），仍有《与阮芸台（元）书》，言及“锡庚近复逃禅”事<sup>⑯</sup>，则其时已六十五岁，仍在世。

该本的另一位收藏家是汪喜孙（1786—1847，字孟慈），他得到椒花吟舫本的年代，可以从顾千里的记述中推断出来。《思适斋集》卷一五收录有《张燕公集跋》与《王摩诘集跋》已如上引，二跋先后记载：“予前别校正燕公文十五卷，又从汪孟慈得椒花吟舫抄本，多出五卷。”“大兴朱氏椒花吟舫有如干家……《张说之》三十卷，江都汪孟慈为予写其副。”其所写副本的底本应当即是此椒花吟舫本。又由二跋题下的系年，知其作时分别为道光“丙戌（1826）”和“丁亥（1827）”，根据李庆《顾千里研究·新订顾千里年谱》“道光六年（1826年）丙戌”条的记载：其时顾千里应聘于秦恩复，在扬州校勘《文苑英华》和《唐文粹》，“千里见秦恩复藏《张燕公集》，跋之。殆是时，千里遍取多种唐人别集，与《唐文粹》参比对勘。”<sup>⑰</sup>因此，顾千里题跋的年代是可信的，而汪孟慈得到椒花吟舫影钞本《张说之文集》的时间也可以确认是在道光六年前，其由朱锡庚转藏应该是无疑的。

“星伯曾观”印的主人为大兴徐松（1781—1848，字星伯）。他也是《张说之文集》热心的关注者，在其力作《登科记考》、《唐两京城坊考》中，散见着许多据张说碑志考订的登科事迹与两京宅第，另外，他曾担任《全唐文》的总纂官，对于寻访全本《张说之文集》自然

非常积极。在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徐松两次亲笔校订的武英殿聚珍版《张燕公集》(善本编号 0517)。其第一次校勘的时间,据扉页题记:“甲子二月廿六日鐙下始校,星伯记。”可知为嘉庆九年(1804),据以校勘者为《唐诗归》、《唐诗品汇》、《全唐诗》、《国秀集》,校语均以蝇头小楷题诸眉端行间。第二次的校勘用行书记录,所据有《唐诗纪事》、《唐文粹》、《永乐大典》、《新唐书》、《国史补》诸书。《永乐大典》的用于校勘告诉我们校记的年代为嘉庆十四、十五年间(1809—1810),其时徐松入全唐文馆任提调兼总纂官,因此得以浏览《永乐大典》<sup>⑩</sup>。但当时未曾经眼椒花吟舫本是可以从校记中得到肯定的。其后不久,徐氏便任湖南学政,第二年即遭弹劾,遣戍伊犁,九年之后的道光元年(1821),才得以赐环归京。所以他看到椒花吟舫本的时间也当在道光年间。

此后的流传因无钤印可考,便只有通过最后的收藏者逆推,傅增湘先生以为:“大兴徐氏亦曾经眼,且或由星伯家而归临清徐司业家,詹亭则得之司业婿史吉甫太史者也。”(《影宋本〈张说之文集〉》跋)临清徐司业指曾任清国子监丞的徐坊(1864—1916,字士言),坊为近代著名文献家,卒后其京寓所藏善本书归于长婿史宝安(字吉甫)。宝安生卒年不详,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宣统元年(1909)预纂《德宗实录》,故有“太史”之称,椒花吟舫本即由其转手于民国著名的藏书家邢之襄(1880—1972,字赞廷,一作詹亭)。

在从徐松到徐坊的递藏中,尚有较长一段时间未能据藏书印推知的缺席。但根据藏书目录却可以找到其间的递藏者。在朱澂(?—1890)所编其父子藏书的《结一庐书目》卷四中,著录有“《张说之文集》三十卷,唐张说撰,旧钞本,朱笥河藏书。”澂父朱学勤(1823—1875)字修伯,号复庐,浙江仁和人,结一庐为其藏书室名,据缪荃孙《朱修伯大理结一庐文集序》记载:“(朱学勤)及官京秩,又值徐星伯、韩小亭、彭文勤公及怡邸之



图书散落厂肆，不惜重值购藏，遂为京师收藏一大家。”<sup>⑩</sup>由此可知《张说之文集》椒花吟舫本确实是从徐松处散落出来，归藏于结一庐。朱澂的结一庐藏书后来由其婿张佩纶（1848—1903）继承，辛亥革命后开始散落出来，徐坊或者就是从张氏卒后获得了该书。因此，有关该书的收藏，似乎可以画出这样一条接替线来：

朱筠——朱锡庚——汪喜孙——徐松——朱学勤——朱澂——张佩纶——徐坊——史宝安——邢之襄——国家图书馆

#### 四、研录山房校钞本《张说之文集》考

##### 1. 版本特点与研录山房主人

由周叔弢（1891—1984）捐赠的《张说之文集》三十卷附补遗一卷清钞本，即东武李氏研录山房校钞本（以下简称“研录山房本”）。其版本情况及价值，也由傅增湘先生在著录与题记中首先揭示：

……前跋属稿甫竟，忽忆及昨岁曾得周君叔弢所藏《张说之文集》一帙，因开篋检视。其书亦正三十卷，为东武李氏研录山房校写本，竹纸，蓝格，半叶十一行，每行二十字，楮墨精雅，爽心悦目。取后五卷与朱竹君家影宋本对勘，各卷篇第正复相符。惟朱钞原本经旧人校过，凡题目、文字咸据《全唐文》标举异同，粘有校签；李氏钞本则录其校语，录于本文下。始知李氏固曾亲见朱氏影本，从而传录，且并其校语而取之也。末有《补遗》一卷，则尽取《全唐文》中佚文附入，凡得三十四首，视结一庐辑补者又增十首。是此集流传于今世者，当以东武李氏所录为最足、最精之本矣。（《影宋本〈张说之文集〉跋》）

《张说之文集》三十卷补遗一卷唐张说撰。清东武李氏研录山房写本，竹纸蓝格，十一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阑。后五卷与朱锡庚家传写宋蜀本全同，各卷录朱本校语于本文之



下。补遗一卷附入《全唐文》所收而为本集所无者三十四首。视结一庐本辑补者又增十首。传世说之集当以此本为最完善矣。周君叔弢藏。（《藏园订补郎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一二上）

该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编号 8380）。定名为研录山房本的根据，是该书每叶版心下方双行印有“东武李氏研录山房校钞书籍”字样。东武为山东诸城一带的汉代旧称，其李氏旺族，藏书代不乏人；而研录山房，则今各种藏书典籍均未见载。要感谢韩理洲先生，他在《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前言》中首先考证出研录山房的主人为李榭<sup>②</sup>。其云：

榭，字松溪，号雨樵，乾隆癸丑（1793）进士，其父李宜芳，雍正八年（1730）进士。关于李榭的生卒年，虽然不能确知，但是从他和他父亲中进士的时间可以推知，他是乾隆、嘉庆、道光朝人。（前言页 7）

前言中对“东武李氏，即山东诸城李榭，研录山房是他的藏书室名”的结论，通过注释提供了论证的来源：

宣统《山东通志》卷一四五：“《研录山房诗钞》，李榭撰，榭有《袜线集》。”卷一三九又曰：“《东武诗存》注云：榭少承家学，积书三万轴，皆手亲校雠。”由此可知，东武李氏研录山房，即李榭藏书室名。（前言页 14 注 23）

韩理洲会校《王无功文集五卷本》的一种，也是“东武李氏研录山房校钞书籍”本，而且经韩氏考订为转钞自朱筠所藏的清钞本。

通过对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研录山房钞本《王无功文集》和《沈云卿文集》合集（善本编号 17201）的调查，可以发现他们共同使用了“东武李氏研录山房校钞书籍”这样一种统一的蓝格竹纸，因此，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的行款是李榭个人喜好的一种形式，并没有故意遵循某种底本原型的特别性；而且，研录山房本《张说之文集》在本文之间夹杂了由《全唐文》对勘而作出的

小字双行校记，自然也使原来的行数、页数都发生了变化。笔者在这里作这样谨慎的交代，是由于《张说之文集》宋本的行款已有混淆的所谓十一行本说法，研录山房本的款式便可能助长这样一种误解：因为同在东武，很容易将研录山房本认为是由刘喜海藏宋刻本转钞，刘氏藏有《张说之文集》十一行本的误解便有可能因此钞本的行款被坐实。

## 2. 钞写年代及其与椒花吟舫本的传承关系

虽然没有时人的记载说明椒花吟舫本与研录山房本二者的关系，但对照两种《张说之文集》可以发现，研录山房本是出自椒花吟舫朱筠钞本的，这与《王无功文集》显示出传承路径的一致性。这种前后关系，在傅增湘先生的题记中已予揭示（见上引），其主要根据是椒花吟舫本对《张说之文集》的目录及张说文二十卷，都有据《全唐文》所作的笺校，而研录山房本过录了这些校语。笔者于此再提供校勘的文字内证予以补充。

首先在校钞年代上，研录山房本晚于乾隆时期的椒花吟舫本。研录山房本的避讳用字，已经出现了对清仁宗名讳“琰”字的缺笔，但不避后来的清宣宗名讳，可证其钞写不晚于嘉庆时期。又因引用了嘉庆十九年（1817）才编定的《全唐文》作校勘，其为嘉庆晚期钞本是可以肯定的。比较椒花吟舫本而言，其避宋讳字如贞、禎、敬、敦、殷等只是非常偶然，而丘、玄、弘、历等字，却不但字字回避，而且后三字，也一律按清时习惯由缺笔变成了改字避讳的方式。

其次，一些仅仅属于椒花吟舫本在钞写时产生的笔误，是研录山房本从而转钞的最有力证据。如卷二《奉和暇日游兴庆宫作应制》，有句云“巢凤新成阁，飞龙奋跃泉”。“奋跃”二字，宋本《文苑英华》卷一七四引此诗作“跃旧”，并有彭叔夏等的小字校记云“集作旧跃”，彭叔夏等的校记作于庆元年间（1195—1200）<sup>②</sup>，其据当时流传之蜀本《张说之文集》校勘应该是可能的；又明以

来刊本所据也为宋刻，均作“旧跃”，可以确证椒花吟舫本所据的宋刻本原作“旧跃”，只是因为“旧”、“奋”二字形近（繁体作“舊”、“奮”）而钞写致误，研录山房因之成误，无可置疑。卷七《和朱使二首》，其一有句云“空传人赠剑，不见虎衔珠。”“赠剑”，《文苑英华》卷二四一及各集本如此，惟椒花吟舫、研录山房作“赠别”；其二有句云“霜空极天静，寒月带江流”，“寒月”也惟此二钞本误作“塞月”。卷八《襄州景空寺题融上人兰若》有句云“旧知青岩忆，偏入杳冥心”，“青岩忆”，各集本同，《文苑英华》卷二三三作“清岩意”，小字注“集作青岩忆”，而此二本“忆”独误作“亿”。凡此种种细节，不一而足。

此外，可以看作椒花吟舫钞手特殊的书写习惯如“剑”作“劔”、“旁”作“傍”、“鐘”作“鍾”、“扬”作“杨”等，研录山房亦步亦趋，未作任何的改变。在卷三所附录的唐玄宗诗《过晋阳宫》中，有句云“运革祚中否，时迁命兹符”，“迁”字，《文苑英华》卷一七四和各集本都按当时的规范用字刻作了“遷”，椒花吟舫本则依俗体随手写成了“迁”；在研录山房本中，则成为另一个字“迂”，这很明显是李槿不能习惯“迁”的写法而误读作了“迂”字，这一沿误，也非出自椒花吟舫本莫属。

在傅增湘先生的《藏园群书题记》卷一七，有《朱少河杂著稿本跋》，其中钞录《少河杂著》篇目的最后一篇《研录山房诗集序》，即是朱锡庚为李槿所作。由此可知二人关系的密切，这为理解《张说之文集》椒花吟舫本与研录山房本之间的传承，同样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 3. 研录山房本的递藏

研录山房本由李槿钞写之后的递藏，可以从丰富的藏书印上了解到。

研录山房本的封面，有隶书题签“张说之文集”，其下小字双行题云“苍茫斋索于寒云主人”，钐印“苍茫斋藏”。在书前总目

首页，则依次钤“华阳高世异印”、“华阳”、“世异长寿”、“一字德启”、“苍茫斋所藏钞本”、“北京图书馆藏”诸印；总目末页则钤“华阳国士珍秘之印”、“曾在周叔弢处”、“高世异藏书记”、“尚同小印”。另外，在三十卷后的补遗卷首页，还钤有“华阳高氏子孙保之”、“宦游所得”二印。

寒云主人是袁世凯次子克文（1890—1931）的号。民国初年，袁克文以其特殊的地位，大肆购藏古书，卓尔成家，研录山房本大概即其时收藏。但因其尤嗜宋元古本，且以前后所得宋本达二百多种而自署“皕宋书楼”；所以对这一清钞并不甚解其实际的意义，而转手给了苍茫斋主人。至于袁克文如何得到研录山房本，因资料阙如，暂无从考述。

苍茫斋主人，据周越然《言言斋藏书目》卷六所载，为华阳（今四川双流一带）人高世异。世异字尚同，一字德启，其生卒、仕历均不详，但周氏《书目》记其藏印甚多。据其“阜城县知吏”印，可知曾宦游河北，或即因此得与津门藏书家来往，并由袁克文处得到研录山房《张说之文集》；以上所记十三印中有十方均可确认属其名下。此书亦当由其转手于天津藏书家周叔弢，再经后者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

由此可以画出的递藏次序是：

李塈——袁克文——高世异——周叔弢——国家图书馆

以上通过对宋本《张说之文集》著录的分析和现存影宋本的考订，论证了宋本的传承关系和存佚情况。其中关于版式问题的论证，直接影响到了对雕版印刷史上宋蜀本系列的行款、年代断定。而在张说集本身的流传中，宋本系统的梳理，也成为元明以来版本研究和文集阅读的重要根据。至于影宋本在宋本缺失、后世各种通行本又都缺佚五卷并舛讹连篇的情况下，也便显示出与宋版同样的校勘价值。这最后一点的具体论证，以及残卷的宋刻钞本的流传影响；限于篇幅和体例，当另文详述。

注：

①《藏园群书题记》中的《影宋本〈张说之文集〉跋》是惟一具有版本源流考证性质的张说集叙录。此后虽有万曼《唐集叙录·张说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1月版），但主要沿袭傅增湘先生的考述。

②据笔者掌握的材料，除了陈祖言《张说年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陈尚君《全唐文补遗》（北京：中华书局待刊）利用了影宋三十卷本外，其余的张说研究论著在文献上主要仍依靠明嘉靖龙池草堂二十五卷系统本和《全唐诗》。

③详细的研究可参严绍璜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二章第二节“藤原佐世《本朝见在书目录》研究”（页87—111）。

④今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2月版）作“二十卷”，所据为百衲本宋刻《新唐书》，而他本《新唐书》则作“三十卷”；“二十卷”的记载仅此一见，且与本传记载及文集流传版本不符，后来的公私藏书家据以著录，均采用三十卷的说法，进而对百衲本《新唐书》的舛误提出批评。

⑤较焦竑略早的钱穀（1508—1578）在对明代通行的《张说之文集》二十五卷本所作跋中，也提到一种来自内阁的更好钞本，其内阁本当即焦竑《国史经籍志》著录的三十卷本，由此也可为三十卷本的存在提供一个旁证。其云：“此集差讹太多，乃隆池以朱书增改，尚欲借酉室手抄内阁本一校，俾为完好也。穀记。”（录自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9024号《张说之文集》卷末）隆池、酉室分别为彭年（1505—1566）、王穀祥（1501—1568）的号。

⑥二者有可能即是同一种“外集”本，其卷数的差异有可能是后者合并以往的二卷为一卷，或者其中一种的卷数版刻有误所致。

⑦转引自傅增湘：《宋蜀本〈司空表圣文集〉跋》，《藏园群书题记》卷一二。

⑧参顾美华：《宋蜀刻本唐人集述评》，载《东南文化》1994年第3期，页113—123。又《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影印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9月影印二十三种唐人集各本卷首。

⑨《皇甫持正文集》蜀刻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9月版，引首页有袁克文“戊午（1918）七月二十三日得于海王村”的题记，目录首页钤“翰林国史院官书”、“颍川榴考功藏书印”、“公愚”诸印。

⑩郑伟章：《文献家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6月版。其“朱筠”



条（页345—348）谓翁心存跋《椒花吟舫书目》今藏北大图书馆，笔者寻访未得，径引郑考。

⑪傅增湘《影宋〈张说之文集〉跋》云：“余少时嗜俚体文字，诵公集，喜其瑰玮骏丽，而灏气流转，神采昌王，与唐初四子务为缛丽、排比叠架者，迥不相侔，实魁然为盖代之才，宜其有‘大手笔’之称。独惜其遗集流传，乃非全帙。”又《藏园订补郎亭知见传本书目》、《藏园群书经眼录》、《藏园群书题记》记载其前后收集、校勘张说集凡十余种，叙录文字五千余言，《张说之文集》三十卷本赖其掇扬而传世，洵为张说集之功臣。

⑫参《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9月影印。

⑬按，据今存其他宋蜀本唐人集可知，当时刻本避讳本身即较为随便，时有不作避讳之现象；椒花吟舫本钞手从笔迹上看有多人，其中一人不避丘、晔二字，显见只是遵循了古本格式，反于清讳倒临文不讳。

⑭《张说之文集》除聚珍版外均以前十卷为诗；顾氏既校文十五卷，则为二十五卷本文集。

⑮这里的论证主要针对顾氏及其沿误者所述蜀刻本问题，笔者也无意否定宋代另有十一行本存在的可能性。因为上引两《唐书》和《郡斋读书志》著录的《张说之文集》三十卷本均在十二行蜀刻本刊印的南宋绍熙之前，其不必是十二行本是完全可能的。但至今尚无资料证明，故暂付阙如。

⑯转引自郑伟章《文献家通考》“朱锡庚”条，页559。

⑰李庆：《顾千里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7月版，页223。

⑱参缪荃孙《徐星伯先生事辑》，载作者《艺风堂文集》（光绪廿七年〔1901〕刊印本）卷一。

⑲载《艺风堂文集》续集（民国二年〔1913〕印行）卷五。

⑳韩理洲校点：《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㉑周必大《纂修文苑英华事始》记其退休以来与士友勘正《文苑英华》，据《宋史》本传，周必大庆元元年（1195）以少傅致仕，而《文苑英华》于嘉泰元年（1201）开雕，其校勘在庆元年间无疑。此役以彭叔夏用力最勤，其《文苑英华辨证》十卷即为明证。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